

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
他尝百草创立中医学
他养蚕，种稻开创了农业
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创始者

炎帝



团结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5102733

12475

912

炎 帝

周濯街/著

团结出版社

6875016

DK27/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炎帝/周濯街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8.9
(神仙传系列)

ISBN 7-80130-199-4

I. 五… II. 周… III. 神话-中国-当代 IV. I 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033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0.7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印次: 1999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80130-199-4/I·8

定价: 16.00 元 (平)

(如有装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序

鄢维新

周濯街先生重新整理了一段上古史，这是笔者读完《炎帝》打印稿后的第一感觉。重整历史是要有一点学识的，也还要有一点胆魄，更还要有一点技巧。

文化发展之现态，依笔者之愚见，历史上需要重整的“段落”太多，而愿做此事的人却太少。周君算是用小说表现这种重整“结果”的一位。

未有文字之前，人们靠记忆来口传历史；有了文字之后，因其为贵族、权势所掌握，故文字所记录的历史便成了“正史”，而“群氓”口传的历史自然成了“野史”。

“正史”往往是奉旨而修，修史者免不了于得意之余浸染几分王道“霸气”，笔端笺上、字里行间自然洋溢着几分自以为是。

前朝后世的“太史公”们不挥舞如椽巨笔相互抵牾、驳正才是咄咄怪事。更何况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古往今来，行去流水的史官中如董狐秉笔直书的史官能有几何？更多的是明里声言“为尊者讳”，实际为保乌纱计，以谄言媚主的无行文人曲笔谀君，把一部“正史”弄得“疑雾重重”。

只有荒山僻野之中的黎民百姓，一无乌纱可丢，二无“球籍”之虑，更犯不着明知天高皇帝远却偏要踮起脚尖充长子，用谄言谀语去讨好八竿子打不着的张三皇李五帝。他们

口传的“野史”中，真实的成分似乎要比“正史”多得多。

就上古历史而言，不妨说，口传史是文字史的“父亲”，文字所记录的历史是口传历史的“儿子”。滑稽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儿子”是“正宗”（正史），“父亲”却成了“野种”（野史）。

究其原因是因为口传历史的时间外衣层次太多，令人们很难凭有限的“目力”穿透层层包装而看清一个完整的“躯体”，如同雾里观花。此情此景颇令一些专家学者为难，也难免产生几分焦躁与恼火。罢罢罢，“你不仁，我不义”，“惹不起，未必还躲不起”，“太史公”们一急之下，“野史”的大帽子便脱口而出，牢牢地戴在了口传历史的头上。

从此，口传历史被打入了历史研究的冷宫。

值得让人“幸灾乐祸”的是，口传历史的冷遇却给后世历史文化研究者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们少了一根颇有功用的“拐杖”，许多“靠得住”的材料（文献、文物）并不能开口说话，只是一堆“死证”而已。如果它们能“活”起来该有多好！

周濯街先生也说：是要让它们“活”起来！

“鄂东鬼才”周濯街先生用他那支惯出偏锋的“秃笔”（因磨耗过甚而秃），拂去口传历史中的时光尘埃，妥善处理了陕西、湖北、湖南三省民间口传历史中争扯神农为“已出”而形成的矛盾。他考诸文物，佐证历史（史籍）——虽然这一些未必都在《神农》一书中直接表现出来，但仍可以看到其考据的痕迹，熔铸诸说于一炉。

从该书有关素材的把握、处理上可以窥见周濯街先生的考研实力。

按照有关史料和口传历史记载，炎帝神农是“生于姜水，幼于湖北，葬于湖南”。显然，这里面空间距离过大，疑窦甚多。对于濯街君来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经过仔细的考辨，谨慎的思索，周君推导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仅把炎帝视为一个部落酋长的名称，那么诸多传说、史料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将炎帝视为某部落（民族）历代首领袭用的称号，那么，陕、鄂、湘三省民间的三个炎帝传说圈的抵牾之处便不难解释了。炎帝家族于500年间辗转，分流至陕、鄂、湘乃至遍天下也是不难理解的。同理，把神农视为炎帝神农与其家传弟子（神农之子女）与异姓弟子的共称，史料、传说之间争扯神农“为己土所出”的纠纷也便迎刃而解了。在此基础上，周君将炎帝神农的父母、兄长（有年）“安排”在陕西出生；神农则理所当然地生于“楚”，长于“楚”——也偶尔“派”他出境“云游”、“执行”一些“援外任务”。至于“葬于湖南”的问题，另“派”一支神农的苗裔去“解决”好了。令人叫绝的是，这种处理与著名史学家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中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创作素材，濯街先生并没有因其难得而“拿来就用”，而是经过了仔细的鉴别、分析才让其进入他的创作素材库。从这一角度而言，濯街先生的神话小说创作是以严谨、较为科学为其基底的。所以笔者说周君在这一部《炎帝》里重整了一段上古史。

虽然如此，但濯街先生并没有把这一部小说当作历史演

义来写——不排除里面仍有演义的因子。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写“神话小说”，没有忘记小说的神话色彩，所以他时刻注意与历史演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尽可能地增添较浓郁的神话氛围。

在《炎帝》里，开篇四章并未让神农出场，以数万字的篇幅交待了天地起源、盘古开天辟地的史前传说，看似为了交待神农之前的一段世界起源史——为神农之事迹作反差较大的铺垫。相比较而言，前四章是纯神话小说，而后面的神农史迹描叙颇似以史实为主的历史人物传记。而实际上，前四章的作用是奠定全书的神话基调，酿造全书的神话氛围。前四章与后面十八章的铆接体现了作者在神话与信史两端“取其中”的态度。把判断《炎帝神农》这内容孰是神话传说、孰是信史的大权交给了读者，同时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

或许，作者在潜意识中把神农之神话传说及史籍记录当作“信史”来运作，但在操作中仍未忘记本书“神话小说”的本质，不忘在强调切实的“信史”描写、叙述中，于关键之所在点染几笔“神话”的浓墨重彩。

翻检全书，于“关键”之处不难看到类似的例证：

“女登刚躺下不久，便发现一条浑身似火的赤龙在其身边转来转去，她怎么赶也赶不走。……不料，她重新躺下后那赤龙立即变成一个小男孩，十分乖巧地依偎在她怀里。……这孩子（炎帝神农）与众不同：是个水晶胸脯透明体。五脏六腑心肺肠肚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就连内脏的各种器官本身也是全透明的——每吃一口奶，喝下一口水之后，是怎

么从食道进入胃部，又如何从胃部进入小肠、大肠再排出来的全过程，无不看得一清二楚。”

“在发现这三天说话，五天走路，七天长牙，九井自穿等一系列奇迹之后，……神农的屁股后面长了个小尾巴，刚出生时大约半寸长左右……不到一年的工夫已经有一尺多长了。……那尾巴长到三尺后便不再长长了。”

用神农自己的话说，“那尾巴是上天赐给孩儿的一根品尝百草的鞭子”。

“用那条尾巴作成的赭色鞭子鞭打百草时，……经过鞭打后的草木，凡是药性平淡的便没有任何变化；凡是药性温热的便有红色的液汁流出；凡是药性凉寒的便会流出黄色草汁；凡是有毒的草木，其浆汁一经流出便立即变成黑色。”

为了使神农加快尝百草的速度和进度，濯街先生又给神农“派遣”了一头尝药的神兽——獐狮。“獐狮不仅能尝百草，而且能尝百虫。什么虫可以入药，让獐狮一试便知。”最后让颇有灵性的獐狮舍己救神农而死。

如果说神农是女登梦龙而孕生纯属附会，神话色彩不浓的话，那么，濯街先生让神农成为“乘龙快婿”——娶天台山赤水河金角老龙的女儿龙女听谗为妻；而且还让他给龙族治病，骑上龙头拐杖便日行千里；最后让他在烈火中涅槃为一条赤色的巨龙就可算得上是震聋发聩、荡人心魄的神来之笔了。

不论是文献典籍还是民间口传的神话传说都应纳入文学的范畴，周濯街先生的“神话小说”更不能例外。作为神话小说也不能缺少人物形象的塑造，塑造人物形象的第一要素

便是对该人物的生活社会背景及性格基调进行时空网络中的定位，有必要勾勒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在《炎帝神农》里，濯衡先生所描绘、勾勒的神农氏的活动背景及其性格基调是较为准确、成功的，切入的角度也有独到之处：

首先，神农氏是游牧生活最早转向原始农业生活的古老民族，而炎帝神农又是神农氏族里的杰出代表人物。原始农户的产生既使人类的生活资料有了较稳定的来源，同时，又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发明创造。所以说，要塑造原始农业社会里的英雄人物，首先就必须凸现他的“开发”之功。所以，一部《炎帝》就是一部炎帝神农从事原始农业（包括医药）的开发、创造史的集大成。

其次，炎帝神农是原始农业初始时期的劳动英雄。他尝百草而治天下之病，健百姓之身，艺五谷而疗民之饥，启群氓之智。浓墨重彩泼写他如何遍尝百草、蕃植五谷，如何解惑授业、传播农业生产、中草药知识而造福于世人。对于他如何治理天下却惜墨如金，甚至完全不予提及。只是为了间接描写的需要，在第十四章里设置了众多部落因神农部落农、医发达，生活富足而主动要求加盟的情节，以“九州加盟”的盛况来渲染炎帝神农的丰功伟绩。

其三，主题的把握及其深入的开掘将引起诸多读者的共鸣。虽然本书作者的本意是“重整一段上古历史”，其客观审美效果未必就没有借古讽今之寓意——当然，这只能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读者们可能会因联想而产生的结果。君不见本书之中，炎帝神农是一个亲尝百草，手植五谷，身体力行，身先士卒的劳动模范；一个耗尽心血救民之

疾苦，启迪诱导人间改造大自然，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栉风沐雨奔波于四海，胼手胝足劳碌于八方的劳作狂。根本看不到他如何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于庙堂之上的情形，更看不到他如何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假公济私，以考察为名，周游天下、花天酒地的蛛丝马迹。本书中的炎帝神农形象给“君王”一词的原始含义作了最好的注解：上古之时的君王在物质享受方面与臣民是平等的，而在心智、体力的付出方面却享有多于众人的特权。彼时的君王动手多于动口，完全没有一点后世“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治世“风范”，简直就是一个以“蠢行”博得“群氓”欢心的“大傻冒”。不过，若炎帝神农在天有灵，或许会觉得后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过是“吏治”之道的一种“退化”也未必。甚会觉得君王们忙于思考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尚且忙昏了头，那有闲工夫去“多动手少动口”的托辞不过是一种“懒人的逻辑”。

其四，或许是受民间口传神话传说之限；抑或是周濯街先生写作手法、技巧的创新；还可能是濯街先生的似笔者一般好吹毛求疵而令人讨厌的朋友太多且聒噪太甚的缘故，在本书的结尾，他一改以往主人公得道升仙的“大团圆”的结尾手法，让炎帝神农“中毒身亡”，酿造出“英雄末路”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又恐读者们伤心太过，于“不团圆”中轻描几笔，加上一个“小团圆”的结局，给人以些许慰藉。既达到了“哀而不伤”的目的，又省却了读者索赔医药费的“隐忧”。

还有一点不得不指出的是：周濯街先生的作品有一个既

是优点也是缺点的特点——在情节的发展中时常点缀一些“说文解字”式的“闲笔”——或解说某些风俗的来源，或解释某些成语、俗语、词语的初始含义，令读者顿开茅塞，恍然大悟，饶有趣味。当它与情节发展浑然一体（具有内在联系，看似信手拈来）时是这样，但当它铺植过密，且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大时便不免有阻隔情节、文气之憾，且有“掉书袋”之嫌。但愿这是笔者看走了眼，或是思维短路的呓语。反正笔者早有一对雌雄尚方宝剑在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96年4月2日凌晨1时18分

于武昌东湖呵云斋

序

神话产生于古老的人类童年时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历来为文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们所重视。但毋庸讳言，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神话学起步较晚。大约在 20 世纪初才由鲁迅、茅盾、周作人等将西方神话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借鉴西方的办法对本国神话进行了研究。

同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则提出了著名的“累层”的历史观和民族的神话观。在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神话学又经历了开拓、发展、探讨等三大阶段。

正因为中国神话学起步较晚，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和大部分东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神话贫乏的国家”，甚至武断地说：“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

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神话学家才深知中国神话是很丰富的，深知中国的神话不仅完全不亚于希腊的、罗马的、北欧的神话，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古代文献中保存着大量的神话，正如钟敬文教授在 1933 年 6 月 10 日给德裔美国学者爱哈伯特的信中所指出的，现在，“还泼刺地存活在民间的农夫、樵子、渔妇们的口碑中的神话和传说等，真可说是相当充实的、闪光的宝库！”

钟先生在同一封信中还指出：“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片断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和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这种见解是否正确，我觉得是颇可怀疑的。中国比较古老的文献上所保存的神话和传说，有着过于简略或破碎之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因此断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必不会产生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传说，光就理论上讲，也是很难讲通的。”

我国学者不仅早在 60 多年前便指出了西方学者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判定”上的错误，而且从那时开始就在不断地为还原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本来面目，为争得中国神话、传说在世界神话、传说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作不懈的努力。特别是 1949 年以后，我国的民族学者、民俗学者和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的搜集、挖掘、整理工作，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流传在各族人民口头上的、活的神话材料和传说材料，并先后出版了不少神话传说故事集，为中国神话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使中国神话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和成果辉煌的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世界各国极为罕见的丰富多彩的中国神话和传说，外国学者无不为之惊讶。中国神话学研究也因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大好局面。

然而，我们因此而沾沾自喜为时尚早。早在 400 多年前，希腊人便将他们的古老神话进行了一番系列化乃至系统化的

整理，而中国神话、传说目前使外国学者惊愕的仅仅是其总体数量和总体份量——就总体质量而言，它至今仍然是零散的、破碎的、不成体系的。

远至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媧、伏羲，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们的始祖炎帝神农与黄帝轩辕，还有号称“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与“五帝”，在洪荒时代治水的大禹等等，这些中国人心目中的远古时代的群神众仙、大神大仙们又有哪一位有过系统的、系列的或正正规规的传记式的文字资料？更谈不上单一的长篇传记了。

不仅这些远古的原生态的神话人物是这样，那些“中古”乃至“近古”的非原生态的“再生性”神话人物，或称之为“仙话”人物的情况亦不容乐观。上至万神之王或万仙之王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有“人间鬼王”张天师、五殿阎罗、丰都大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下至千里眼、顺风耳、赤脚大仙、土地菩萨、灶王爷等等，除了周濯街先生几部信笔涂鸦的拙劣之作，其他人物也大都有“神”无“话”。

这里的“无‘话’”主要是指经、传、典籍中“无‘话’”；而这里的“有‘神’”，也主要是指经、传、典、藉中的“有‘神’”。中国的神话领域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民间传说中的12000多位神仙，在《山海经》、《搜神记》、《三教搜神大全》、《绘图历代神仙传》等古籍中几乎都能找到其姓名、出处、职责等有关内容，却又大多仅此而已。也许是神仙太多的缘故罢，在所有的经、传、典籍中对于神仙人物的具体“业绩”大都是点到即止。即便是专门的“神仙传记”，也大都是几百字的人物小传，很少见到千字左右的“中

传”，更不要说数千字的“大传”了。

对于神通广大的群神众仙而言，千字左右的小传本不像“话”，更重要的是即便这种少得可怜的不像“话”之“话”的“有话之神”，也不足千名，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中国神话领域存在的另一个同样有趣的现象是——凡是经、传、典籍中所有的“神”，在民间都有“话”；不仅有“话”，而且有说不完的“话”。

我曾不只一次地给几家出版社、杂志社的有关编辑说过一句“大话”：“在中国的 12000 多位神仙当中，无论你们点哪一位，我都能为其写出 10 万字以上的传记来。”并非濯街先生有什么与众不同乃至超凡脱俗的本领，实在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早就为他们心目中的每一位神仙都“撰述”（而不是撰写）了一部洋洋数万言甚至是洋洋数十万言的人物传记。

实在是因为中国的神仙们，古往今来都不是依靠“神以文传”的方式存活于老百姓的心目之中，而是以“神以话传”的方式立于世界神话之林。

也许这种“神以话传”的独特形式才是正宗的神话特征，至少也应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神话特征。就个体而言，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色独具的存活方式无疑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神话这种到目前尚无任何根本改观的存在方式或存活方式，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只能是零散的、片段的，因而也是“支离破碎”的。

究其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学这种口耳相传或口

口相传的传承方式，只能适应于篇章短小的单个故事在民间迅捷而又持久地传播。

因此，这一民间文学的长处、优点又恰恰是中国神话的短处和缺陷。即便我们将同一个神话人物的有关故事、传说集中在一起出一本集子（已经有人这样做过），它给人的总体印象仍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此类古老的传承方式永远也难以形成令世人震撼的“拳头产品”、“重磅炸弹”。

正是鉴于上述原因，我才下定决心要用编撰系列神仙传记的方式，使看上去支离破碎的中国神话系统化、系列化、文学化，让全世界都有可能通过阅读的方式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国神话。由于时间有限生命亦有限，我不可能为 12000 位神仙各写一部长篇传记。因此，我只能首先为中国 30 至 40 位知名度较高的神仙，各写一部 20 万字左右的长篇神话小说，或称之为长篇神仙传记。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它们串联成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基本上可以将民间诸神全部包容其间的《中国民间诸神演义》。

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仅有我一个人在这样做的问题，武汉大学中文系李惠芳教授在其大作《〈七仙女正传〉述评——读周濯街神仙传奇系列之一》一文（见《通俗文学评论》1994 年第 3 期）中这样写道：“周濯街先生要为民间诸神立传，并不是为了媚俗，也不是要赶海弄潮另谋一条生路。周濯街不是专业作家，他不需要靠‘爬格子’证明自己的价值……濯街君要圆一个梦！”

“80 年代初期，随着湖北民间文学工作的广泛开展，周君步入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的行列。赁着他深扎于民间大